

# 试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阈下的布拉格汉学派研究

袁 喆

**摘要:** 布拉格汉学派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是一个以普实克为首的海外汉学研究团体。主要关注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等领域, 有着众多的学术成果和较高的学术地位。本文主要就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讨论, 试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角度来研究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特点和贡献。

**关键词:** 布拉格汉学派,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结构主义

## A Study on Sinology of Pra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Semiotics

Yuan Zhe

**Abstract:**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a research community headed by Prusek,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Focusing primarily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is widely accepted and admired for its many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the Prague School and summari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s of Prague Sinolog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semiotics.

**Keywords:**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Marxist semiotics, structuralism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1006

##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融合了结构主义衍生的符号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文学视为符号文本进行解读，其代表人物有詹姆逊、巴赫金、阿尔都塞等等。而布拉格汉学派则深深受到了当时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影响，试图将文学放入历史经验的角度进行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植根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布拉格汉学研究也怀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就有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高利克（Marián Gálik）以及米莲娜（Jarmila Kalousková）等。本文就以上三位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为重点讨论对象，试图探寻布拉格汉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

## 二、作者的历史经验下的文学阐释

受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影响，布拉格汉学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挣脱俄国形式主义的窠臼，寻求阐释文学发展规律的倾向。布拉格结构主义是在俄国形式主义基础之上发展出的理论。其主要思想摆脱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弊端，即主张文学内部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与外界因素毫不相关。俄国形式主义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从共时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作为一种符号文本的形式。其主要研究文学作品内部的结构，而忽视了文学作品受到时代社会的影响，也忽视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而布拉格结构主义则在关注作品内部结构的基础之上，将文学作品放在历时的角度进行考察，考察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研究诸系统中的系统。布拉格汉学派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有着许多契合之处。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对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进行批评，认为其过分强调“共时性”的存在样态，而排斥“历时性”的历史范畴。俄国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无法摆脱历史时间的历史性影响的。仅仅在共时系统内部分析结构的构成是片面不可取的，最终都只能伴随着现实、历史意识的萌生，从作者的社会性意识中体现出来。詹姆逊所倡导的是将“共时性”形而上学的思想与“历时性”社会批评实现辩证统一。他认为：“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的存在，总是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验。”（2004，p. 8）这一观点可从普实克和米莲娜的研究中体现。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将作家的社会生活经历与作家作品相结合，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他认为文学内部结构的发展与文学外部因素息息相关，文学内部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应在研究系统内部的结构的同时，

考虑到系统外部的诸多因素，以此来总结历史的结构、结构的历史。普实克认为：“新文学出现的根本条件不是一种新的语言，而是要有以现代方式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能用现代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新兴趣，革命首先要作家的头脑中产生，然后才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1987，p. 119）普实克并非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他认为新文学的出现与时代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身处新时代的作家，只有新的社会历史经验在头脑中产生以后，才能够创造出新的文学。由此可见，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认为，文学是作家的社会历史经验的反映，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补充这一观点的还有布拉格汉学家米莲娜，她认为：“分析文学作品内部的结构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作者所处的社会状况，更有利于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1981，p. 497）于是米莲娜在分析中国文学时，更倾向于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普实克与米莲娜完满地阐述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社会历史经验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作家的生平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可以更好地分析作家创作作品的意图以及作品内部的结构。相反，通过对作品内部结构的解读，也能够更好地分析作家的生活背景。

不仅如此，关于作者、社会、文学作品三者的关系，普实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做了更充分的研究。他认为：“从非常普遍的意义上讲，每一部艺术作品取决于三个互相联系、共同作用的因素，作家的个性，最广义的现实性以及艺术传统。”（1987，p. 83）“外在刺激对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是必要的，在较为单一的文化环境下，文学本身的自然进化并不能产生全新的结构。”（1987，p. 131）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的变革对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家又因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而具备不同的社会经验，由此看来，社会与作者和文学作品之间就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普实克并非重点论述文学、社会、作家共时的关系，而是试图引入历时的变化，将三者的动态关系表现出来。这充分地体现了詹姆逊关于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要想超越本身，就必须将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转变为历史的范畴。也就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所设想得最终的基本模式——隐喻、转喻、修辞手段和二元对立必须引入历史的范畴才会超越结构主义本身的局限性。”（2004，p. 14）由此看来，普实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文学结构的发展变化超越了传统结构主义的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由于普实克着重关注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则忽视了文学的主体性，也忽视了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高利克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引言中提到：“包

含有各种复杂素材的系统—结构现实，最终将反映于文学作品中，而社会的系统—结构现实通常在文学作品中又是最重要的项目（即现实及其社会部分）……批评家既权衡客观的系统—结构现实（材料关联域），也权衡其符号学上的系统—结构现实（文学关联域）。”（1997，p.5）这一观点正好解释了布拉格汉学派中国文学批评家如何从符号学的角度将材料关联域和文学关联域结合起来，建立文学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

于是，根据布拉格汉学家的研究，作者、社会历史、文学作品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闭合关系。三者的正向关系即社会历史的演变导致作者历史经验的变化，作者历史经验的变化就导致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反之则形成一种反向关系，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就能推测作者以及社会历史的所发生的变化。

### 三、意识形态、阶级与文学的关系

布拉格结构主义者的观点中，也强调了文学作为一种符号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穆卡洛夫斯基认为：“具体艺术作品只是一种外在符号（用索绪尔的术语就是能指），它在集体意识里产生相关的意义（通常被冠之以‘审美对象’），这些意义是由那些某一社会集团所共有的、同时又有具体作品所激发的主观意识状态所决定的。”（1977，p.18）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与作者所处的社会集团密切相关，而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又与阶级和意识形态关联密切。受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影响，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也对这一问题有所探讨。普实克将社会变革、统治阶级的变化与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晚清时期中国文学形式的变化是由统治阶级的变化导致的，文学具有阶级性。“属于下层的和民间的文学潮流现在在文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正如地主阶级被人民革命所清除那样，这一阶级的文学也同样被剥夺了它的地位。”（1987，p.29）普实克通过文学的发展变化来反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即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主要来自社会内部的力量，即使欧洲并未侵略中国，也不会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的历史推动着文学史的发展，而文学史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符号的文学，其所指在某一社会阶层、某一集团内部产生意义。这便产生了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某一社会集团的主观意识。就如巴赫金所说：“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也包括语言符号，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实现时，都是由这一时代的社会氛围和该社会团体所决定的。”（1998，p.363）那么，社会变革会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由经过变化了的社会心理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会呈现出来。符号是由某

一社会集团共同认定的，并因此而产生意义。作为符号文本的文学也是由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所共同认定的，其所指也会随着社会集团的变化而变化。普实克所谈观点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这一观点。除此之外，布拉格汉学派的另一位学者高利克也在他的研究中讨论了意识形态、阶级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进行了分析。高利克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都看作是系统一结构的组成，从作家的生平事迹中看待作家的文学理念的发展，又从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作家的阶级特征以及意识形态。

高利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社会革命的武器的形态出现的，比如在分析现代批评家茅盾时，高利克认为茅盾应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学问题，并认为艺术的完整性与社会阶级的健全性息息相关。茅盾推崇现实主义文学，反对先锋派文学，并认为新思想会体现在文学内容中，而文学形式的变化是一种病态。“他把这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表述方式归入他的文学和批评观点的‘系统一结构整体’中。”（1997，p. 203）又如高利克在研究郭沫若的文学作品时，认为郭沫若的批评是无产阶级的批评，其本质就是为无产阶级代言。高利克并没有全部赞同郭沫若的看法，而是更客观地评价郭沫若的机械的文学革命论的观点。虽然如此，从高利克的评价中可见，他还是将作家与作家本身所处的集团、所代表的阶级联系起来，同时，高利克也肯定了马克思反对物质基础绝对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论断。他看到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由此可见，高利克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并将自己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引入其中。与此同时他又反对绝对的机械论，认为文学的发展不仅仅受到意识形态以及阶级的影响，同时文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脉络。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调和机械的反映论和绝对的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即从文学外部和文学自身来看文学的发展，并将历时的范畴与共时的描述结合起来。詹姆逊认为，法国结构主义将视点集中到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上层建筑上，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可信的。文学内容是社会历史的具体产物，因此必定会根据历史形势及意识形态的变迁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而包括新批评在内的各种形式主义文学观，却无法对文学中相应的意识形态内容作出及时必要的反映。在这一点上，高利克的文章对詹姆逊的观点进行了完美的诠释。如高利克认为，鲁迅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观点进入了中国文学史，进入了中国现代哲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推翻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教及其制度作了贡献。高利克在分析鲁迅的文学作品时，将鲁迅的作品放在时代经验当中，在关注其文学作品

的历史性维度的同时，也关注了作品当中的意识形态，将社会、历史及政治等因素引入了其研究当中。

总的说来，普实克与高利克都认为文学与意识形态和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符号的文学文本，首先是特定的社会集团所共同约定的结构，因而它反映了特定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其发展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与中国现代的社会革命、阶级变化关系密切。由此可见，布拉格学派的观点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想。

#### 四、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

布拉格汉学派研究文本与作家、作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并非机械的反映论。受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影响，布拉格汉学派同样重视文本内部结构以及文本的主体性。穆卡洛夫斯基将艺术看成一种符号学的事实，他针对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受到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影响。“他强调艺术结构发展是连续的和以内在合法性为特征的；它具有一种自我运动。于是不应当把艺术只看做是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艺术结构中的变化确实受到外部的刺激，但是这些冲击被感受和发展的性质与方向，却只取决于内在的美学前提。”（布洛克曼，1981，p. 77）布拉格汉学家同时也关注到了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米莲娜实际上也受到了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影响，但其更加关注文学作品内部结构的系统。她认为，分析文学作品内部的结构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作者所处的社会状况，更有利于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于是米莲娜在分析中国文学时，更倾向于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这在米莲娜的研究中可见端倪。在她的《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中，可以看到米莲娜借用什克罗夫斯基和穆卡洛夫斯基的观点来证明，中国小说同西方的小说一样，都处在共同的组织原则当中，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但米莲娜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将语义结构的重要性考虑其中。而在她的《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她从汉语的特点入手，分析人称变化对叙事模式的影响。这说明米莲娜仍旧以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对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再如，米莲娜的《鲁迅的“药”》曾被高利克称为最好的运用结构主义分析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文中，米莲娜强调通过分析鲁迅文章的内部结构来反观鲁迅的个人经历。据米莲娜所说，鲁迅的文章具有错综复杂的结构，只有通过系统地分析文章结构才能够弄清鲁迅文章所蕴含的潜在意义。她认为：“作者个人经历中的这些人

物转化成了作品中的主要形象，而他们的基本特点，如年龄、性别等都是由结构上的考虑来决定的。”（1981，p. 499）由此可见，米莲娜认为鲁迅的作品是作家个人经验的转化，而在转化的过程中，作品结构的需要决定了转化的结果。她还在文章中提出两个原则，一是控制材料原则，二是动态对比原则。按照文章组织结构的需要来安排情节是控制材料原则的根本，而动态对比原则则决定着时间的次序，决定着作品的主要结构。动态对比是典型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正如詹姆斯所说：“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主要范畴是二元对立的观念，即一切意义都是按照音位学的模式，以成对的对应或确定的差异加以组织。”（2004，p. 11）米莲娜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基于结构主义方法之上，实质上是对其师普实克的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虽然她主要分析文章的内部结构，但其理论基础并没有脱离布拉格汉学派的主要思想。

而同为普实克学生的高利克，在研究鲁迅的《呐喊》时，则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进行了分析。高利克将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与鲁迅的个人生平经历联系起来，对文中的意象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例如，他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铁屋子”作为一个符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和迦尔洵、莱蒙托夫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这两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并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对所指的时代意义进行考察。高利克说：“他（尼采）说疯狂将净化人，鲁迅将这一格言译成了一句他自己的概念的元语言。”（1990，p. 39）这种元语言作为能指为鲁迅的概念指明所指，那么鲁迅的作品就承载了所指的意义。高利克认为鲁迅的“狂人”与迦尔洵的《红花》中的无名疯人和安特莱夫的《我的记录》中的无名半疯人相似，而它们都生活在“铁窗格”中。高利克对“铁窗格”公式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认为铁窗格公式具有时代意义，代表当时儒家思想对人的禁锢和束缚。“在《狂人日记》中，他至少给了这间铁屋子一扇铁窗格。在这一格窗的四个格子中，这位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分别放进了四个字，他们代表着儒家伦理原则的本质，即：仁、义，以及儒家世界观的基本原则：道、德。”（1990，p. 34）从这个角度来说，“铁窗格”也成为鲁迅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其所指的意义也较为清晰。罗曼·雅各布森曾提出隐喻和转喻的概念，“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汽车的运动）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词（甲壳虫的运动）之间提出的相似性或类比为基础的”（霍克斯，1987，p. 78），高利克所说的“铁窗格”公式正是一种隐喻，用来隐喻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而这种隐喻只有放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够产生意义，这也正如雅各布森所认为的那样，语境使信息具有意义。而“铁窗格”公式只有在鲁迅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产生了特定的意义。除

此之外，高利克称自己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所用的是“系统—结构整体”的方法。借用皮亚杰的观点，高利克认为整体性和结构中各种因素变化的必要性是这种结构的特性，所以高利克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主要围绕这一方法进行。高利克将作者的经历以及作家心理的变化作为作者文学系统中的变化的因素，分析文学作品的同时根据作家心理以及作家丰富的经历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解读。由此可见，高利克分析共时的文学作品的同时又兼顾了作家历史经验变化的历时因素。高利克不仅对单个作家的作品的解读采用“系统—结构整体”的方式，对中国文学史的分析也采用了“系统—结构整体”的方式，即以每个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及个人经历为变化的因素，而以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为系统，这种分析的方式，体现了高利克的结构主义倾向。

## 五、布拉格学派的思想体系

由以上分析可见，布拉格汉学派主要受到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其中的缘由是很复杂的。首先，布拉格汉学派起源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而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发源地又在布拉格，1929年布拉格召开首届国际斯拉夫语大会，此后布拉格语言学派迅速建立起来。布拉格汉学派产生之时正值俄国形式主义向布拉格结构主义过渡时期，所以从布拉格这些汉学家的研究中可见几种理论交汇的痕迹。此外，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研究中国当时的文学的布拉格汉学家结合中国国情，受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已经不再拘泥于文学是一个封闭完善的自治系统，而是打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局限性，着眼于系统的系统，所以布拉格汉学家主要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中的变化因素进行解读。与此同时，对历时因素的探讨冲出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将文学作品看作系统结构中的“符号”，更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正迎合了当时中国文学的需求，所以布拉格汉学派在布拉格蓬勃发展既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也有现实的必然性。

从普实克、高利克和米莲娜的代表作品中，可以看到三者既有相通的理论基础，又有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基于布拉格汉学派的师承关系的特点，可以看到高利克与米莲娜的理论思想的源头都来源于布拉格汉学派的开山鼻祖普实克，即将文学作品放在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并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以及演变进行分析。普实克更加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通过观察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来反观历史的演变，



在作家所处的社会背景中试图寻找文学变化的内部规律。而高利克则更加侧重于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做出同质的比较,从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阶级来探讨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在此过程中,高利克的研究处处闪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这也同他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三者之中,米莲娜是最忠实的结构主义方法使用者。在米莲娜的研究中,更加侧重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就文学结构本身展开讨论,探讨了近代中国戏曲以及现代文学的叙述模式。米莲娜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者,受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布拉格结构主义影响颇深。以上三者的理论互为补充,形成了布拉格汉学派的主要思想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布拉格汉学派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其研究还存在着不足。如普实克与高利克一度强调作家的历史经验对于分析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读者的反应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偏重于比较文学研究,高利克在研究中难免会有过度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倾向。而米莲娜则更忠实于分析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这就相对忽视了文学作品所处时代对文学内部结构的影响。不过,由于布拉格汉学派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这些缺陷也是一种必然现象。

##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布拉格汉学派的研究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思想。在研究对象、本国学术环境等多重影响下,布拉格汉学派受布拉格结构主义影响颇深,并在后期开始与法国结构主义与美国结构主义接轨。不仅如此,布拉格汉学派能够适时跳出结构主义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学作品进行历时的分析。

### 引用文献:

- 巴赫金(1998).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于钱中文(主编),周边集(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布洛克曼, J. M. (1981). 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高利克,玛丽安(1990).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伍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高利克,玛丽安(199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陈圣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霍克斯,特伦斯(1987).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莲娜 (1981). 鲁迅的《药》. 载于乐黛云 (编). 国外鲁迅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普实克, 雅罗斯拉夫 (1987).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李燕乔, 等,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詹姆逊 (2004). 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第二卷. (王逢振, 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ukarovskiy J. (1977). Poetic language. In Mukalovsky J. Burbank J, Stener P. *The world and verbal art selected essay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袁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布拉格汉学派。

**Author:**

Yuan Zhe,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whose research field is Sinology of the Prague School.

Email: 605875768@qq.com